

孫中山集外集

陳旭麓

郝盛潮 ● 主編

王耿雄等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雲南雜誌社鑒
振我民氣

孫文題祝



孙中山集外集

陈旭麓 郝盛潮 主编

王耿雄等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术编辑 杨德鸿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孙中山集外集

陈旭麓 郝盛潮 主编

王耿雄等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5 插页10 字数 653,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3,500

ISBN7-208-00661-X/K·139

定价 16.60元

序 言

陈 旭 麓

近十年,对孙中山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较过去做得最多、成绩也很显著的时期。其他且不说,单以中华书局于1981—1986年陆续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来说,搜集的篇目与范围,不仅远远地超过了所有先前出版的《总理遗教》、《孙中山全集》一类书,而且也大大地超过了六十年代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六卷。随后,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又将陆续发现的新资料和大陆《孙中山全集》中刻出的而《国父全集》遗落了的篇目,编为《国父全集补编》,1985年出版。

由于孙中山的数十年革命生涯,奔走国内外,足迹及于欧、美、亚、非各地,历经艰险,频繁地接触了国内各个阶层的人,也频繁地接触了海外华侨和各国的军政领袖及社会人士,当以数十万计。因此,有关他的文献虽广事搜集,仍然是难竟全功的。我们就《孙中山全集》所遗落及最新发掘的文献,所获达一千二百余件,加上《国父全集补编》中的三百余件,共一千五百多件,编为《孙中山集外集》。这个“集外集”,乃是《孙中山全集》的“集外集”。

根据所集文献的体裁不一,繁简悬殊,这个“集外集”,不象《孙中山全集》统一地按年月先后排列,而是分类编次的。它分作论著、演说、谈话、函札、文电、宣言、文告、规章、杂著、公牍十

YK06/3206

2 孙中山集外集

类。各类中都有前次未及掲載的重要文献，而需要说明的是谈话、杂著、公牍三类。因为这三类文献散遗最广，历来的编者对之不太措意，这里都尽可能搜集编入。其中的“公牍”大都是批示和任命状，单件的文字很少，所占的篇目却最多，它广泛地反映了孙中山周围的人事关系及其间的变嬗，是研究中国政党和人才消长的重要资料。

至于“谈话”，在这个“集外集”中占的比重最大，约十万字，占四分之一，收录了孙中山从1895年直到1925年3月他逝世前一天(11日)的谈话。它的来源：一、当时报刊上新闻记载；二、各地档案保留下来的纪录；三、当事人著作中留下来的话语；四、亲见亲闻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一是在孙中山生前和死后不久的记述，一是五十年代以后的追忆（这些追忆难免渗入了后来的认识）。“谈话”多为要求孙中山回答或双方所要探讨的问题，思想是具体的，语言是鲜明的，因此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及的色泽。如，1910年4月在檀香山的谈话中说：“这支军队不可能全是满洲人。他们可以任命许多满洲军队军官，但是军队的大部份将是中国人。当满洲王朝指望使用这支军队去使政府为人民接受时，这支军队能够颠覆篡位者并压碎他们。在我看来，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会睡觉。只要一种思想感情在中国军队中鼓动起来，它将使这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去反对政府而不是为它服务……”这段话，深刻而又鲜明地反映了孙中山对清王朝的清醒认识和他发动新军运动的思想。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孙中山“反满”革命，推翻清廷，实现共和，最重要的方式是利用新军举行暴动。然而，清王朝为了维护其垂危的封建统治，“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当时已编练了

十三镇(每镇一万多人),并计划在六年之内,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拥有三百多万现役军人。这支军队,对于革命党来说,不能不是个严重的威胁。对此,中外不少人士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能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免有些疑虑。孙中山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他看清了清王朝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并满怀信心地说:革命党对满洲政权是有威胁的。“不过,更大的危险来自王朝自身的弊病”,也就是它正在建立的“这支军队”。孙中山正是利用清王朝这一“自身的弊病”,通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展新军运动,使新军中的下级军官日益倾向革命,成为武装暴动的主要力量,从而获得了武昌起义的伟大胜利。

又如,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的一再邀请,于18日由沪赴京,与之商谈国是。孙中山的沿途谈话、在京谈话,特别是同袁世凯的十三次谈话,对于研究孙袁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对于研究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的谋略及其品格,是十分宝贵的。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虚伪为人、阴险奸诈,是有所闻的。就在孙中山准备北上之时,袁世凯还谋杀了武昌起义的元勋张振武和方维。因此,孙对袁邀请面商国是的诚意,也不是没有怀疑的。但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胆识,抱定利国利民的愿望,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决然地前往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时表现出“以国家与人民为念”的虚情假意,使孙中山被袁的假象所迷惑。于是,他与袁“握手言欢”,称赞袁“雄才伟略”,“善于练兵”,“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袁)莫属”。以至他推心置腹地对袁说“袁总统可练兵一道很在行,彼作十年总统,必能为中国练五百万雄兵。我与造铁道之事颇有研究,使全国人民赞成我的政策,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以统一中国。”又说“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此时,好象只要孙袁携手合作,一个抓军事,

一个抓实业,中国在十年之内就可以“国强民富”了。但袁世凯和孙中山并不是一条心的,只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在9月16日的袁孙饯别宴会上,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对话:袁佯作酒醉,拊孙曰“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莞尔从容对曰:“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这段对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袁孙“同床异梦”的各自心态。

再如,1923年孙中山在与某记者谈话中说:“中华民国就象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我,却又叫我不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历来说到孙中山受到帝国主义的鄙视和歧视,在其晚年倾向苏俄,“以俄为师”,没有比这段话表述得这样清楚的。他的意态跃然纸上。

应该说,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是厌恶的,但一度也是抱有幻想的。他曾殷切地渴望得到列强的帮助,然而,“日本小气,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与马伯援谈话》),“美国以孙聘请美顾问为条件,孙答应了,但美还是不给援助”(《与达林谈话》)……。但是,孙中山在这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苏俄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22年6月,也就是在孙中山祸生肘腋——陈炯明叛变之时,他在永丰舰上通过陈友仁转达对苏俄代表达林的通讯谈话中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此后,他力排各种干扰,开始接受中国

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了三大政策，使他晚年的思想有了“伟大的发展”。当然，这一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是同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

“集外集”所收文献资料和图片，主要是王耿雄同志长期搜集、积累的。这些文献资料，对《孙中山全集》作了重要的补充，有许多新的东西。它的编辑出版，对于进一步研究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是很有价值的。



Photo Taber, San Francisco.

孫逸仙

1896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三藩市(旧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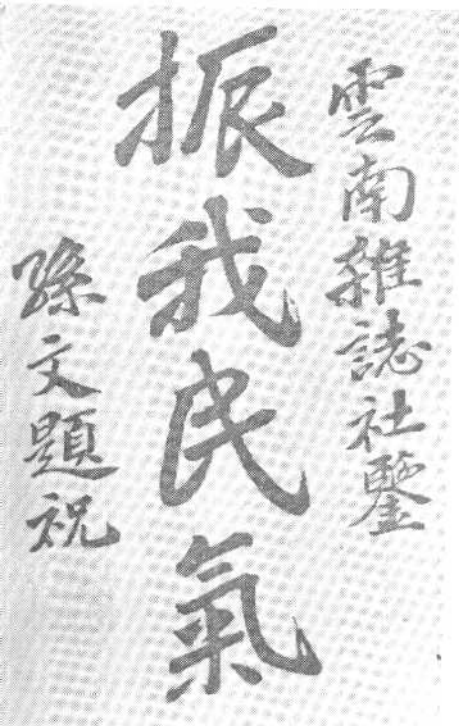


1901年2月孙中山
在日本赴本州和歌山县
访问南方熊楠（后排左
一）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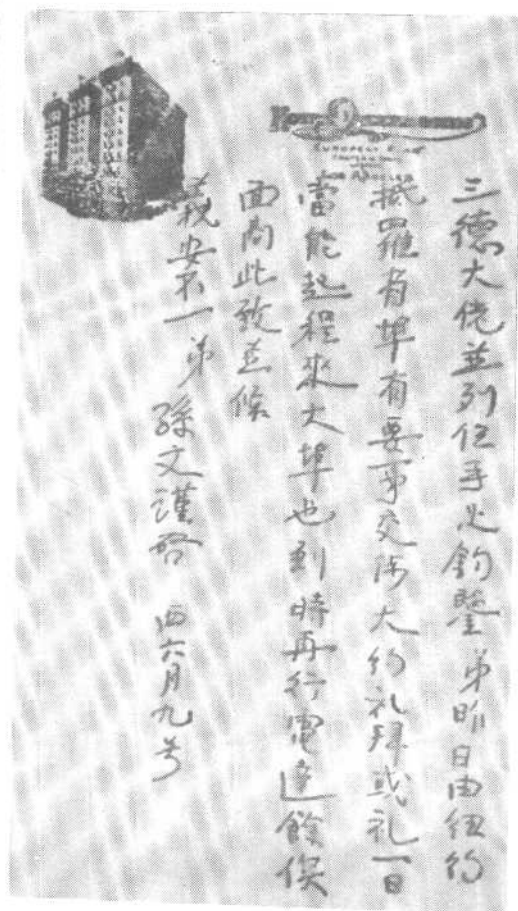


同盟会成立时的孙中山

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
为《云南杂志》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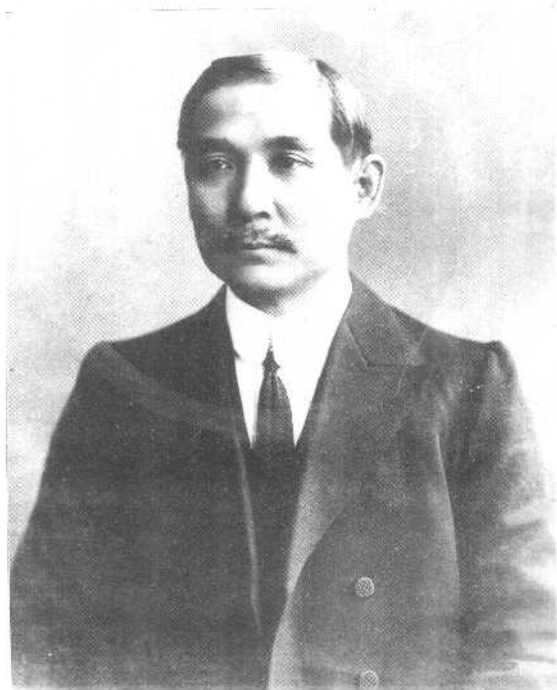
1911年6月9日孙中山
致黄三德函手迹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香港
在轮船上与山田纯三郎合影



1912年孙中山在
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孙中山在总统府与部分内阁成员一起合影
左起：吕志伊、于右任、居正、王宠惠、孙中山、黄钟瑛、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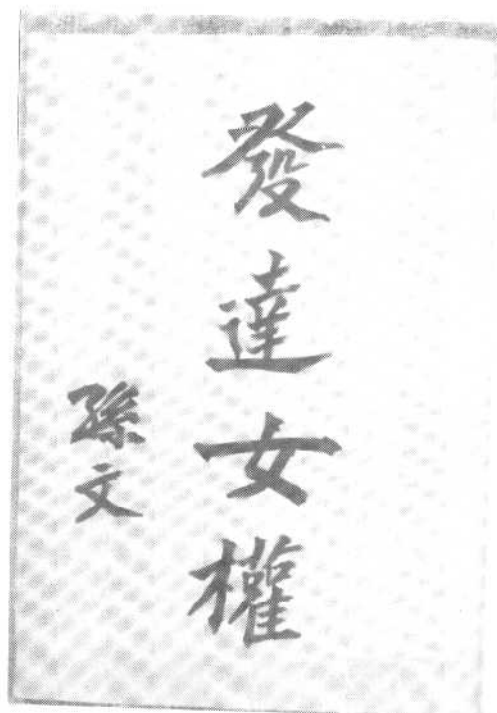
1912年4月孙中山赴辛亥首义之地—武昌，受到湖北军政人员的热烈欢迎



1912年5月孙中山全家在广州合影

前排：孙中山和卢夫人

后排左起：女儿孙莹、子孙科、秘书
宋霭龄、女儿孙婉



1912年11月孙中山为
《神州女报》创刊号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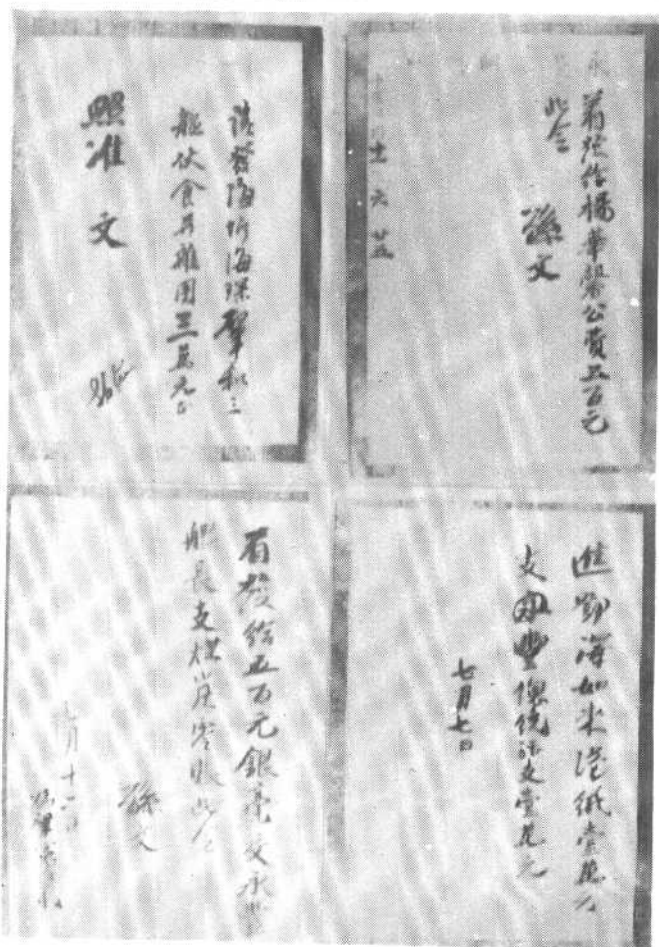
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在东京与梅屋庄吉合影



1917年8月6日孙中山在广州欢宴程璧光等南下护法的海军将士



1918年孙中山在
上海开始从事著述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亲躬理财的手令



1922年9月孙中山与廖仲恺、胡汉民、张继、杨庶堪及日本朋友在上海合影